

## 重订曲阜孔庙元代加封孔子碑两通

□杨海文

摘要：曲阜孔庙有两通元碑，一通刻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的诏书，另一通刻加封孔子的圣旨以及致祭孔子、颜子、孟子的祝文三首。鉴于目前学术界的释文存在一定不足，有必要重新释读这两通碑文；并借此重订，进一步了解元代尊孔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其重要意义。

关键词：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曲阜孔庙；元碑

作者简介：杨海文（1968—），男，湖南长沙人，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

基金项目：中山大学中国哲学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建设专项基金。

据《元史》卷二十二《武宗本纪一》记载，大德十一年（1307年）秋七月辛巳，加封至圣文宣王为大成至圣文宣王<sup>[1]484</sup>。“大成”二字典出《孟子·万章下》第一章“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sup>[2]215</sup> 阎复（1236—1312年）时任翰林学士承旨等职，其《静轩集》卷四《加号大成诏书碑阴记》有云“噫！自木铎声沈千八百年，有国家者追崇圣号非一。至唐玄宗始进爵为文宣王，宋真宗加‘至圣’二字。是皆议出一时，虽□徽美之称，孰若我朝取孟子之言为准，以圣誉圣之深切著明也！”<sup>[3]551</sup>

元代以前，有两位皇帝加封孔子最为给力：一是唐玄宗李隆基（685—762年，在位时间为712—756年）封孔子为文宣王。据《旧唐书·玄宗本纪下》记载，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八月甲申，“制追赠孔宣父为文宣王，颜回为兖国公，余十哲皆为侯，夹坐”<sup>[4]211</sup>。这里有意味者，南朝的萧子良（460—494年）早被封为文宣王。《南齐书·武十七王列传》有竟陵文宣王萧子良本传<sup>[5]692-701</sup>，《弘明集》卷十一存其《文宣王书与中丞孔稚珪释疑惑（并笺答也）》一文<sup>[6]73-74</sup>。

二是宋真宗赵恒（968—1022年，在位时间为997—1022年）先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继而改封为至圣文宣王。据《宋史·礼志·吉礼八》“文宣王庙”条，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诏追谥曰玄圣文宣王，祝文进署，祭以太牢，修饰祠宇，给便近十户奉莹庙”<sup>[7]2548</sup>；据《宋史·真宗本纪三》，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二月壬申，“改谥玄圣文宣王曰至圣文宣王”<sup>[8]152</sup>。

这里可注意者，北宋已以“大成”命名辟雍的文宣王殿。据《宋史》“文宣王庙”条，崇宁（1102—1106年）初，“诏辟雍文宣王殿以‘大成’为名”<sup>[7]2550</sup>；政和三年（1113年），“颁辟雍大成殿名于诸路州学”<sup>[7]2551</sup>。

具体到曲阜孔庙，有两通碑刻与元武宗孛儿只斤海山（1281—1311年，在位时间为1307—1311年）这一加封圣旨密切相关：一是题署时间为大德十一年（1307年）的《加封孔子诏碑》，现位于孔庙十三碑亭东起第四亭内中偏东；二是题署时间可视为至大元年（1308年）的《加封孔子圣旨及致祭先师颜孟祝文碑》，现位于孔庙十三碑亭南面西起第三亭内东排南石。前者曾由曲阜孔庙、京师国子监，遍布全国勒石褒章，但曲阜孔庙碑与全国各地碑的汉译部分存有细微的文字差异；后者曾由蔡美彪（1928—）、骆承烈（1935—）先后过录，但两个誉本的文字差异极大。本文拟以原碑拓片或照片为依据，重订曲阜孔庙这两通尊崇孔子的元碑。

### 第一通《加封孔子诏碑》

今人编纂的《全元文》卷六百九十二《元成宗二》，从《蔚州志》卷九录出《加封孔子诏碑（大德十一年七月）》。全文如下：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盖闻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朕纂承丕绪，敬仰休风，循治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於戏，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惟圣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资神化，祚我皇元。主者施行。<sup>[9]253-254</sup>

《全元文》把《加封孔子诏碑》的作者定为元成宗孛儿只斤铁穆耳（1265—1307年，在位时间为1294—1307年），此乃明显的误断。盖因大德十一年春正月癸酉，成宗“崩于玉德殿，在位十有三年，寿四十有二”（《元史·成宗本纪四》<sup>[1]472</sup>；同年五月甲申，武宗即位于上都（《元史·武宗本纪一》<sup>[1]478</sup>。另，经复核，《全元文》所录文字，与《[光绪]蔚州志》卷九《元加封孔子诏碑（有阴）》一致<sup>[10]935</sup>。

据邢鹏考释，北京国子监孔庙此碑的文字为：

上天眷命

皇帝圣旨盖闻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

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

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朕纂承丕绪敬

仰休风循治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加号

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于<sup>①</sup>戏父子

之亲君臣之义永惟圣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

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资神化祚我

皇元主者施行

大德十一年七月十九日

奉训大夫国子司业臣潘迪书亚中大夫国子司业臣谢端篆臣茅绍之刻<sup>[11]</sup>

比对上面两种碑文，有差异者乃“永□圣教之尊”一句，蔚州文庙碑作“维”，国子监孔庙碑作“惟”。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曾公布《加封孔子诏碑》的拓片藏品五幅，其中有河北蔚县文庙碑，索书号为“各地1393”。今蔚县即古蔚州。经比对，蔚县文庙碑拓片作“惟”，并不作“维”。以“惟”为“维”，实乃《[光绪]蔚州志》及《全元文》的误写。

骆承烈汇编的《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收有《大德十一年加封制诏碑》，全文为：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盖闻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朕纘承丕绪，敬仰休风。循治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呜呼，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惟圣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资神化，祚我皇元。主者施行。

大德十一年九月日<sup>[12]250</sup>

“纂”作“纘”，“於戏”作“呜呼”，此乃曲阜孔庙碑与前述蔚州文庙碑、国子监孔庙碑的两处差异。国图公布的《加封孔子诏碑》拓片藏品，亦有曲阜孔庙碑，索书号为“顾专 1046”。经比对，骆录与拓片一致。

以上列举的三碑，其题署时间并不一样：国子监孔庙碑署“大德十一年七月十九日”，蔚州文庙碑署“大德十一年七月”，曲阜孔庙碑署“大德十一年九月”。其实，议定圣号，时在七月；颁发诏书，时在九月。因此，曲阜孔庙碑的题署时间合乎历史事实，国子监孔庙碑及蔚州文庙碑把它提前了两个月。另外，读各种金石志和访碑录，我们当知其云“……年立”者均指题署时间，而实际的立碑时间通常不等于、而且晚于碑上的题署时间。比如，国子监孔庙碑实际立于至元二年（1336年）十月<sup>[11]</sup>，安徽当涂文庙碑实际立于至正二年（1342年）六月<sup>[13]</sup>。这是因为：据云南大理发现的加封孔子圣旨及立碑文告，至大二年（1309年）五月十九日，钦定全国立石；颁发此一圣旨，则在九月以后<sup>[14]96</sup>。

除了题署时间不同，曲阜孔庙碑与全国各地碑的碑文差异也值得探究。七月份议定圣号后，加封圣旨由阎复九月份草拟。《元文类》卷十一《制》录其《加封孔子制（大德十一年九月）》：

盖闻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朕纂承丕绪，敬仰休风，循治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於戏！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惟圣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明言之教。尚资神化，祚我皇元。<sup>[15]134</sup>

阎复作于至大三年（1310年）的《加号大成诏书碑阴记》亦云：

大德丁未秋，近臣传旨，议加至圣文宣王封号。臣复承乏翰林，获预其议。窃谓自古称夫子者多矣，而莫如孟子。孟子曰：“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又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盖言孔子集三圣之事，为一大成之事；犹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宜加号。奏可。玺书锡命。臣复职，当具草，既已颁示天下矣。<sup>[3]551</sup>

《加封孔子诏碑》先由阎复草拟，再经群臣润色，继而下达曲阜，其后颁示天下。既然是圣旨，曲阜孔庙碑与全国各地碑不当存在文字差异。《元文类》所收阎复的草稿，无“上天眷命，皇帝圣旨”“主者施行”等语，乃至“奚罄名言之妙”被四库抄手誉成“奚罄明言之教”，均为情理中事。但是，它并未把“纂”写作“纘”，“於戏”写作“呜呼”。由此或可猜测，曲阜孔庙碑的“纘”“呜呼”极有可能是刻工之误。其中，“於戏”不能简化为“于戏”，也不读 yúxì，而是同“呜呼”，读 wūhū。所以，把“於戏”刻成“呜呼”，并不算是太离谱。

清代学者毕沅（1730—1797年）、阮元（1764—1849年）的《山左金石志》卷二十二《曲阜县孔庙加封制诰碑》有言：

大德十一年立。并额，俱国书。译文，正书。碑高八尺三寸，广二尺七寸。在曲阜县孔庙。

右碑额，蒙古书，三行。其上刻译文，正书。“大成至圣文宣王诏书”，三行，字径七分。文八行，左读，旁以正书释之。末行年月，上有钤印，方径五寸。<sup>[16]700</sup>

由《山左金石志》所述的形制，可知国图拓片以及骆录均阙碑额部分，骆录还阙蒙古文部分。承蒙曲阜师范大学青年学者宋立林惠赐照片，笔者得以获知碑额“大成至圣文宣王诏书”字样的分行情形。下面，我们也不誊录蒙古文（因受学力所限），而以“额三行”（A）、“文八行”（B）的格式，并加标点符号，对曲阜孔庙的《加封孔子诏碑》予以重订：

大成至（A1）

圣文宣（A2）

王诏书（A3）

上天眷命，（B1）

皇帝圣旨：盖闻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B2）

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B3）

朕纘承丕绪，敬仰休风，循治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加号（B4）

“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呜呼！父子之亲，君臣之义，（B5）

永惟圣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资神化，祚我（B6）

皇元。主者施行。（B7）

大德十一年九月日（B8）

有元一代，《加封孔子诏碑》由阙里孔庙而遍及天下学宫，流布广，影响大。择其要者有二：

第一，封号之高，空前绝后。《明史·礼志四·吉礼四》“至圣先师孔子庙祀”条有言：“汉晋及隋或称先师，或称先圣、宣尼、宣父。唐谥文宣王，宋加至圣号，元复加号大成。”<sup>[17]1296</sup>元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名号之高，由汉及宋，历代帝王无出其右者<sup>②</sup>。另外，由元及明，这一名号维系了223年。《明史》“至圣先师孔子庙祀”条记载，洪武三年（1371年），“诏革诸神封号，惟孔子封爵仍旧”<sup>[17]1296</sup>，《明史·世宗本纪一》记载，嘉靖九年（1530年），“冬十一月辛丑，更正孔庙祀典，定孔子谥号曰至圣先师孔子”<sup>[18]223</sup>。《明史》“至圣先师孔子庙祀”条对此次改号的记录表明，由“大成至圣文宣王”到“至圣先师孔子”，实乃孔子地位的下降<sup>[17]1298-1300</sup>。清代，孔子亦为“先师”而不是“王”，名号之高比不上元代。据《清史稿·礼志三·吉礼三》“至圣先师孔子”条，顺治二年（1645年），“定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sup>[19]2533</sup>；十四年（1657年），又改为“至圣先师”<sup>[19]2534</sup>。

第二，赞誉之极，无与伦比。《加封孔子诏碑》所言“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与最早被北宋唐庚（1070—1120年）《唐子西文录》记录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sup>③</sup>，并称为极尽能事以尊崇孔子的两大名言。达三（生卒年不详）道光二年（1822年）序江藩（1761—1830年）的《国朝宋学渊源记》有云：“尝观元代之尊孔子曰：‘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至哉言乎！不唯有明讲学者所弗能及，即宋儒极力推崇，连篇累牍，亦未有若是之精确者也。”<sup>[20]150</sup>

## 第二通 《加封孔子圣旨及致祭先师颜孟祝文碑》

全国各地的“加封孔子诏碑”称名不一，第二通曲阜孔庙元碑亦如此。清代学者孙星衍

(1753—1818年)、邢澍(1759—?)编的《寰宇访碑录》卷十一《元》，题其名为《加封孔子圣旨及致祭先师颜孟祝文》<sup>[21]575</sup>。本文从之，并于末尾加“碑”字。

《民国续修曲阜县志》卷八《艺文志·金石二·碑志》录有两通元碑的碑文，一为《加封孔子圣旨及致祭先师颜孟祝文》，二为《祭孔庙碑阴致祭记》<sup>[22]225</sup>。从内容看，笔者起先以为前者刻于碑阳，后者刻于碑阴。事实上，它们并非刻于同一石。盖因前者实为骆承烈所录的《至大元年懿旨释奠祝文碑》，“位于孔庙十三碑亭院西起第4亭内，西面南石，面东”，碑阴有《至大元年皇妹大长公主祭孔庙碑》<sup>[12]255</sup>；后者才是本文所说的第二通曲阜孔庙元碑。又，《民国续修曲阜县志》卷八先刻印前两通碑文，接着刻印《皇妹大长公主鲁王祭孔庙碑》(亦即骆录的碑阴部分)<sup>[22]225-226</sup>。经比对，这三通碑实乃乱点鸳鸯谱，既有碑文相互错置者，又有题名相互错置者，此或为济南同志印刷所的误植。可分两步予以正确匹配：第一步，前两通的碑文互换，形成新第一通、新第二通；第二步，新第二通与原第三通的题名互换。如此，方能各归其位。

对于孔子的名号及其赞誉，《加封孔子诏碑》可谓“永惟圣教之尊”，又“奚罄名言之妙”。这些均为仅仅刻石于阙里的《加封孔子圣旨及致祭先师颜孟祝文碑》不能望其项背，但是，该碑有其重要价值者三：

一曰文献学价值。大德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六月初八日、七月十九日，元武宗先后三次下旨，命群臣商议加封孔子圣号之事。该碑这一叙述，加上阎复同年九月草拟圣旨，构成为创制《加封孔子诏碑》的全过程，足以弥补《元史·武宗本纪一》之简略，并匡正《元史·祭祀志五》“宣圣”条之讹误“至大元年秋七月，诏加号先圣曰大成至圣文宣王。”<sup>[23]1892</sup>

二曰思想史价值。据《元史·祭祀志五》“宣圣”条记载，延祐三年(1316年)秋七月，“诏春秋释奠于先圣，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sup>[23]1892</sup>；至顺元年(1330年)，封“颜子，兖国复圣公；曾子，郈国宗圣公；子思，沂国述圣公；孟子，邹国亚圣公”<sup>[23]1893</sup>。此碑有祭祀孔子、颜子、孟子的祝文三首，揭示了颜、曾、思、孟配享及封圣之前，元代朝野以“孔颜乐处”及“孔孟一体”为价值取向，颜、孟的地位高于曾、思。

三曰语言学价值。元人常把蒙古文案牍直译成汉语白话文，以广传播。其刻之于碑，则为白话碑。现存的元代白话碑数量较少，因其价值独特，素为海内外学术界重视。其论述之作，有冯承钧(1887—1946年)编《元代白话碑》(商务印书馆1931年5月初版)，以及祖生利的博士学位论文《元代白话碑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0年5月)；其辑录之编，有蔡美彪的《元代白话碑集录》(科学出版社1955年2月第1版)。《加封孔子圣旨及致祭先师颜孟祝文碑》的主体部分即是白话文，可资语言学者深入研究。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下文即将讨论的《加封孔子圣旨及致祭先师颜孟祝文碑》，我们这里把1983年9月于云南大理发现的另一通“加封圣诏”白话碑亦过录如下：

皇帝圣旨里，云南诸路行尚书省准(一行)  
尚书省咨该“至大二年五月十九日，太保三宝(二行)  
奴丞相奏：在先孔夫子汉儿帝王虽是封赠了，(三行)  
不曾起立碑石来。如今各处行与文字封赠了，(四行)  
于赠学地土子粒钱内教立碑石呵，今后学本(五行)  
事的人，肯用心也者。奏呵，奉(六行)  
圣旨：‘是有。那般者。’钦此。照得先据御史台呈，亦为此事，已(七行)  
经遍行去讫，都省咨请照验，钦依施行。”准此，省(八行)

府合下仰照钦依施行。经议札付者。(九行)

至大二年五月十九日。(十行)<sup>④</sup>

对于本文讨论的第二通元碑,《山左金石志》卷二十二《元石》题其名曰《孔庙加封祭祀碑》,并述其形制:

至大元年七月立。正书。碑高六尺四寸,广二尺六寸。在曲阜县孔庙。

右碑文二十行,题名三行,字径一寸。又祝文三首,字径五分。<sup>[16]701</sup>

蔡美彪 1955 年出版的《元代白话碑集录》,收有《一三〇八年曲阜加封孔子圣旨致祭碑》。全文为:

至大元年七月内,朝廷差官钦赉圣旨加封祭祀事。

先于大德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今上皇帝正位宸极。当月二十八日,集贤院官特进大司徒太子太傅集贤院使香山、集贤大学士资德大夫赵也先、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太子少傅集贤大学士王颢奏:唐宋以来,累朝代,孔夫子封赠的名儿与来。今日皇帝初登宝位,孔夫子的名号,教众学士商量与着呵宜的。一般奉圣旨商量了名儿,我行再奏者。钦此。六月初八日,香山司徒幹(幹?)赤大学士、赵大学士、王大学士、安大学士奏:“如今众学士商量定:加封孔夫子作大成至圣文宣王。大都、上都、孔林,差人依旧例致祭,牲加太牢,赉制词、香、祝文洒去呵,怎生。”奉圣旨,钦此。七月十九日,中书省奏:“孔夫子加封名号,翰林集贤官人他每的言语是的。一般降与圣旨,差人祭祀去呵,怎生。”奉圣旨,准钦此。至大元年三月二十三日,怀莱东壁集贤院使御史大夫脱脱丞相,集贤学士通议大夫师著奏:“加封孔子与了词头宣命。如今与课银叁锭,表里段子壹拾叁足,并合用祭祀物件,差本学士骑坐铺马前往孔林祭祀去。更大都、上都合用祭物,交与呵,怎生。”奉圣旨教省家与者。钦此。差遣本院学士嘉议大夫王德渊于七月钦赉宣词祭物到于孔林,于十一日丁卯,与守土官奉训大夫兖州知州马禧、孔氏家长抚,行三献礼。王德渊亲为祝文,宣赐银币,珍藏庙庠。

五二代曹州教授之明书。五十年代孙孔氏家长抚立石。

鲁人石匠张德,石聚。<sup>[24]54</sup>

对照《山左金石志》所述,蔡录阙祝文三首。祝文用古文写,而不是用白话文写,其阙当因《元代白话碑集录》的著述体例使然。骆承烈 2001 年出版的《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收有《至大元年加封孔子及致祭颜孟祝文碑》,祝文三首则被过录。其全文为:

至大元年七月内朝廷差官钦赉圣旨加封祭祀事,先于大德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今上皇帝正位宸极,当月二十八日集贤大学士资德大夫赵也先,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太子少傅集贤大学士王颢奏,唐宋以来累朝代孔夫子封赠的名儿,与来今日皇帝初登宝位,孔夫子的名号,教众学士商量与着呵,宣的一般奉圣旨商量了名儿,我行再奏者,钦此,六月初八日,香山司徒幹赤大学士、王大学士、安大学士奏,如今众学士商量定加封孔夫子作大成至圣文宣王,大都、上都、孔林差人依旧例致祭,牲加太牢,赉制词香祝文酒去呵,怎生,奉圣旨准钦此,七月十九日中书省奏,孔夫子加封名号,翰林集贤院官人他每的言语是的、一般降与圣旨,差人祭祀去呵怎生,奉圣旨准,钦此,至大元年三月二十三日,怀莱东壁集贤院使御史大夫脱脱丞相、集贤学士通议大夫师著奏加封孔夫子与了词头宣命如令,与课银叁锭,表里缎子壹拾叁尺,并合用祭祀物件,差本院学士骑坐铺马,前往孔林祭祀去,更大都、上都合用祭物交与呵,怎生,奉圣旨,教□家与者,钦此,差遣本院学士,嘉议大夫王德渊,于七月钦赉□词祭物到于孔林,卜于十一日丁卯与守土官奉训大夫兖州知州马禧、孔氏家长抚行三献礼,王德渊亲为祝文宣赐

银币，珍藏庙库，皇帝敬遣集贤院学士嘉议大夫臣王德灏谨以银币牲牢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大成至圣文宣王。□，惟□秉德生之，垂教不朽，圣之时者，天何言哉，由百世后莫能违，自生民来未之有，特加封号，大展祭仪，仍命臣僚往祀林庙。兖国公□□□□□□□□独冠四科之首，不违三月之仁，宜配圣庭，式严禋祀。邹国公，惟公生有淑质，思济斯民，述尧舜之道，遂乃著书拒杨墨之徒，非为好辨，位尊侑坐，祭重推诚，五十二代曹州教授之明书，五十代孙孔氏家长抚立石。<sup>[12]253-254</sup>

此碑的白话文部分，两位先生的断句有差异，骆录甚至一逗到底，均不难理解。但是，蔡录、骆录的文字差异极大，表明碑文有重订的必要。承蒙曲阜两位青年学者宋立林、王汉岫居中襄助，传来孔子研究院孔勇拍摄的此碑照片。下面，我们据原碑照片，以“碑文二十行”（A）、“祝文三首”（B）、“题名三行”（C）的格式，并加标点符号，对《加封孔子圣旨及致祭先师颜孟祝文碑》予以重订：

至大元年七月内，（A1）

朝廷差官钦赉（A2）

圣旨加封祭祀事。先于大德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A3）

今上皇帝正位宸极。当月二十八日，集贤院官特进大司徒太子太傅集贤院使香山、集贤大学士资德大夫赵也先、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太子少傅集（A4）

贤大学士王颙（A5）

奏：“唐宋以来，累朝代，孔夫子封赠的名儿与来。今日（A6）

皇帝初登宝座，孔夫子的名号，教众学士商量与着呵。宜的一般。”奉（A7）

圣旨：“商量了名儿，（A8）

我行再奏者。”钦此。六月初八日，香山司徒、幹赤大学士、赵大学士、王大学士、安大学士（A9）

奏：“如今众学士商量定：加封孔夫子作大成至圣文宣王。大都、上都、孔林，差人依旧例致祭，牲加太牢，赉（A10）

制词、香、祝文、酒去呵，怎生？”奉（A11）

圣旨，准。钦此。七月十九日，中书省（A12）

奏：“孔夫子加封名号，翰林、集贤院官人他每的言语是的一般。降与（A13）

圣旨，差人祭祀去呵，怎生？”奉（A14）

圣旨，准。钦此。至大元年三月二十三日，怀莱东壁集贤院使御史大夫脱脱丞相、集贤学士通议大夫师著（A15）

奏：“加封孔夫子与了词头（A16）

宣命。如今与课银叁锭，表里段子壹拾叁疋，并合用祭祀物件，差本院学士骑坐铺马前往孔林祭祀去。更大都、上都合用祭物，交与呵，怎生？”奉（A17）

圣旨：“教省家与者。”钦此。差遣本院学士嘉议大夫王德渊于七月钦赉（A18）

宣词祭物到于（A19）

孔林，卜于十一日丁卯，与守土官奉训大夫兖州知州马禧、孔氏家长抚，行三献礼。王德渊亲为祝文，宣赐银币，珍藏庙库。（A20）

皇帝敬遣集贤院学士嘉议大夫臣王德灏谨以银币、牲牢、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大成至圣文宣王：□！惟□秉德生知，垂教不朽。圣之时者，天何言哉！由百世后莫能违，自生民来未之

有。特加封号，大展祭仪，仍命臣僚往祠林庙。兖国公□□□□□□独冠四科之首，不违三月之仁。宜配圣庭，式严禋祀。邹国公，惟公生有淑质，思济斯民。述尧舜之道，遂乃著书；拒杨墨之徒，非为好辩。位尊侑坐，祭重推诚。(B)

五□二代曹州教授之明书。(C1)

五十□代孙孔氏家长抚立石。(C2)

鲁人石匠<sup>张德</sup>刊。(C3)  
石聚

以上重订，与蔡录、骆录以及《民国续修曲阜县志》(以下简称“县志”)有何不同呢?下面，我们侧重文字差异，并兼及个别史料、句读问题，作出相应说明。

——A4 “集贤院官特进大司徒太子太傅集贤院使香山。”按，骆录阙此句。

——A7 “宜的一般。”按，“宜”，骆录作“宣”。

——A9 “香山司徒、幹赤大学士、赵大学士、王大学士、安大学士。”按，“幹”，蔡录作“幹(幹)”;“香山司徒、幹赤大学士”，蔡录、骆录视为一人，但实为两人，参见A4以及赵文坦的相关考释<sup>[25]79-80</sup>，“赵大学士”，骆录阙。

——A11 “制词、香、祝文、酒去呵，怎生?”按，“酒”，蔡录作“洒”。

——A12 “圣旨，准。”按，“准”，蔡录阙。

——A13 “翰林、集贤院。”按，“院”，蔡录阙。

——A15 “怀莱东壁。”按，“壁”，蔡录作“璧”。

——A16 “加封孔夫子与了词头。”按，“夫”，蔡录阙。

——A17 “宣命。如今与课银叁锭，表里段子壹拾叁疋，并合用祭祀物件，差本院学士骑坐铺马前往孔林祭祀去。”按，“宣”，骆录作“宜”;“今”，骆录作“令”;“段”，县志<sup>⑤</sup>、骆录作“缎”;“疋”，骆录作“尺”;“院”，蔡录阙。

——A18 “教省家与者。”按，“省”，县志作“○”，骆录作“□”。

——A19 “宣词。”按，“宣”，县志作“○”，骆录作“□”。

——A20 “卜于十一日丁卯……珎藏庙库。”按，“卜”，蔡录阙“珎”，县志、蔡录、骆录作“珍”，但异体字宜保留。

——B: 祝文三首。因其字号比其他碑文小一倍，加上风化等原因，现已很难辨认，亦无法分行。这里据县志、骆录，存其原文，并略作考正。如，“秉德生知”之“知”，县志、骆录作“之”;“往祠林庙”之“祠”，县志作“词”，骆录作“祀”。又，A20有“王德渊亲为祝文”句，因而，“王德灏”实乃“王德渊”，祝文三首乃王德渊(生卒年不详)的佚文，此可补《全元文》之阙<sup>⑥</sup>。

——C1: “五□二代。”按，“□”，蔡录阙，县志、骆录作“十”。

——C2 “五十□代孙。”按，“□”，县志、蔡录、骆录阙。

——C3 “鲁人石匠<sup>张德</sup>刊。”按，县志、骆录阙此行<sup>张德</sup>，蔡录作“张德，石聚”，  
石聚

据《山左金石志》所云“题名三行”，当双行合一;“刊”，蔡录阙。

以上，我们就曲阜孔庙有关孔子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的两通元碑进行了力所能及的重订。因学力不足以及原碑风化严重，《加封孔子诏碑》未能过录蒙古文部分，《加封孔子圣旨

及致祭先师颜孟祝文碑》未能释读出祝文三首。这两大缺憾只能寄望于后来者裨补阙漏，并期盼原碑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否则，风吹雨洒旋成尘，就会一“平”如洗，最终变得一贫如洗。蒙元时期，孔子有“天的怯里马赤”之誉。《草木子》卷四下《杂俎篇》尝言“立怯里马赤，盖译史也，以通华夷言语文字。昔世祖尝问孔子何如人。或应之曰：是天的怯里马赤。世祖深善之。盖由其所晓以通之，深得纳约自牖之义。”<sup>[26]83</sup>明于此，保护好那些石头上的文献，其实亦是护守民族文化最好的体现！

注释：

- ① 按，当作“於”，“於戏”不能简化为“于戏”。
- ② 按，西夏仁宗人庆三年（1146），尊孔子为文宣帝。这里暂录三则史料。其一，虞集《西夏相斡公画像赞》：“夏人尝尊孔子为至圣文宣帝，是以画公象列诸从祀。”（〔元〕苏天爵编《元文类》卷十八《颂》，《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年版，第223—224页）其二，《宋史》卷486《列传第二百四十五·外国二·夏国下》：“十六年，尊孔子为文宣帝。”（〔元〕脱脱等撰《宋史》第40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025页）此“十六年”者，乃南宋绍兴十六年（1146）。其三，《西夏书事》卷36《起宋高宗绍兴十五年尽三十二年》“绍兴十六年（金皇统六年）、夏人庆三年”条“三月，尊孔子为文宣帝。”“令州郡悉立庙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清〕吴广成《西夏书事》，《续修四库全书》第3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版，第582页；又见〔清〕吴广成撰，龚世俊、胡玉冰、陈广恩、许怀然校证《西夏书事校证》，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417页）或谓“文宣帝”乃历代帝王赐予孔子的最高封号，然《二十五史》仅《宋史》有此一条记载，且以“外国”目之，亦即不为正统认可。
- ③〔北宋〕唐庚撰、〔南宋〕强行父辑《唐子西文录》，《续修四库全书》第17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版，第405页下栏—406页上栏。按，原文为“蜀道馆舍壁间一联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不知何人诗也。”
- ④方岭贵《云南元代白话碑校证》，《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第76—77页。按，杨益清最先过录此碑，其释文为“皇帝圣旨里，云南诸路行尚书省准尚书省咨，该至大二年五月十九日太保三宝奴丞相奏，在先孔夫子汉儿帝王虽是封赠了，不曾起立碑石来，如今各处行与文字封赠了，于瞻学地土子粒钱内教立碑石呵，今后学本事的人肯用心也者奏呵，奉圣旨是有那般者，钦此。照得先据御史台呈，亦为此事，已经遍行去讫，都省咨请照验，钦依施行，准此，省府合下，仰照验钦依施行须议割付者。至大二年五月十九日。”（氏著《大理发现元初同刻一石的加封孔子圣旨及立碑文告》，《文物》1987年第11期，第96页）两者的断句有异，可见元代白话碑虽为白话，今人亦未必容易理会。又，方文“经议札付者”句，杨文作“须议割付者”。“须”“经”孰是孰非，因杨文所刊照片模糊，难以确定。据常规，当作“须”（参见孙永汉修，李经野、孔昭曾纂《民国续修曲阜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74册，凤凰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255页上栏；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上册，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253、255页）。
- ⑤参见孙永汉修，李经野、孔昭曾纂《民国续修曲阜县志》，前揭书，第255页下栏。
- ⑥按，《全元文》卷987收王德渊文5篇（参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31册，2004年版，第17—21页），阙此祝文3首。

参考文献：

- [1]〔明〕宋濂，等. 元史（第2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 [2] 杨伯峻. 孟子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10（第3版）.
- [3]〔元〕阎复. 静轩集〔M〕//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2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 [4]〔后晋〕刘昫，等. 旧唐书（第1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5] [南朝梁] 萧子显. 南齐书 (精装本) (第2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 [6] [南朝梁] 僧祐. 弘明集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 [7] [元] 脱脱, 等. 宋史 (第8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8] [元] 脱脱, 等. 宋史 (第1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9] 李修生 (主编). 全元文 (第22册)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 [10] [清] 杨笃. [光绪] 蔚州志 [M] // 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 (编). 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 (第3册).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 [11] 邢鹏. 北京国子监孔庙元代《加号诏书》碑考 [N]. 中国文物报, 2006-11-15 (5).
- [12] 骆承烈 (汇编). 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 (上册) [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1.
- [13] 李森, 傅冬华. 青州文宣王碑额探考 [N]. 中国文物报, 2009-02-18 (6).
- [14] 杨益清. 大理发现元初同刻一石的加封孔子圣旨及立碑文告 [J]. 文物, 1987 (11).
- [15] [元] 苏天爵 (编). 元文类 [M] //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367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2—1986.
- [16] [清] 毕沅, 阮元. 山左金石志 [M] // 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 (编). 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 (第1册).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 [17] [清] 张廷玉, 等. 明史 (第5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8] [清] 张廷玉, 等. 明史 (第2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9] 赵尔巽, 等. 清史稿 (第10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20] [清] 江藩 (著). 钟哲 (整理). 国朝汉学师承记 (附《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国朝宋学渊源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21] [清] 孙星衍, 邢澍 (编). 寰宇访碑录 [M] // 续修四库全书 (第904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2003.
- [22] 孙永汉 (修). 李经野, 孔昭曾 (纂). 民国续修曲阜县志 [M] // 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 (第74册). 南京: 凤凰出版社、上海: 上海书店、成都: 巴蜀书社, 2004.
- [23] [明] 宋濂, 等. 元史 (第6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24] 蔡美彪. 元代白话碑集录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5.
- [25] 赵文坦. 元代尊孔“大成至圣文宣王”的由来 [J]. 历史教学 (高校版), 2009, (22).
- [26] [明] 叶子奇. 草木子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The Revise of the Two Stone Steles Titled Confucius in the Yuan Dynasty

Yang Haiwen

**Abstract:** The two stone steles in the Confucian Temple in Qufu are engraved in the Yuan Dynasty. One is the edict granting Confucius the title of “da cheng zhi sheng wen xuan wang” (the Holy Scholar); the other is the corresponding imperial decree and three congratulatory messages paying respects to Confucius, Yanzi and Mencius. Currently there are some deficiencies in the explanations of the two steles in the academic circle, so it is necessary to reread and study the two stele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status and significance of Confucius in Chinese history.

**Key words:** Confucius, “da cheng zhi sheng wen xuan wang” (the Holy Scholar), the Confucian Temple, stone steles

(责任编辑 薛正昌)